

邵雍文学思想研究

魏崇周 著

觀棊大吟

伊川邵雍堯夫

人有精游藝予嘗觀奕棊筭餘知造化着外見
幾微好勝心無已爭先意不低當人盡賓主對
面如蠻夷財利激于衷喜怒見于頰生殺在于
手與牽指于頰戾不殊冰炭和不侔墳墓義不
及朋友情不通夫妻珠玉出懷袖龍蛇走千里
金湯起樽俎劒戟交解幃白晝飛黃馬
蛟螭空江響雷電陸海誅



中州古籍出版社

邵雍文学思想研究

魏崇周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邵雍文学思想研究/魏崇周著. —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5348 - 3216 - 1

I. 邵… II. 魏… III. 邵雍(1011 ~ 1077) - 文学思想 - 研究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2734 号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郑州市智丰印刷厂

开本: 640mm × 960mm 1/16

印张: 18

版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功致先王：邵雍早期的文学思想	16
第一节 早年邵雍的志士心态	18
一、宋初“回归三代”的倡议与邵雍的“致先王之事”	19
二、宋初“前理学期”学术状况与邵雍的学术性格	30
三、科举失利、庆历新政失败与邵雍立功理想的幻灭	33
第二节 邵雍的学术渊源及潜藏的隐士倾向	37
一、邵雍早期所处的地理环境	38
二、邵雍早期所受的家庭影响	40
三、邵雍的师学传承	45
第三节 邵雍早期的文学创作倾向	53
一、北宋诗歌“沿袭”期、“复古”前期的特点	53
二、邵雍早期诗歌的特点	54
第二章 口代天言：邵雍中期的文学思想	57
第一节 “口代天言”的提出及其含义	57
第二节 “志士在畎亩”的心态	61
第三节 “口代天言”对文学功用的诉求	77
一、圣人与天道的一致性及邵雍的思维模式	78
二、《皇极经世书》的“以经法天”	80

三、《伊川击壤集》的“明善恶”	83
四、“以《春秋》表仪《五经》”	93
第四节 “口代天言”对诗歌境界的要求	95
一、邵雍对近世诗人的批评	95
二、邵雍对“无我之境”的追求	101
第五节 “口代天言”对创作的要求及邵雍的创作实践	111
一、“经道之余”的文道关系论	111
二、“四不”的创作原则	112
三、“八因”的创作过程论	115
四、邵雍“乐”与“忧”的创作主题与其天道观的离合 ..	117
第三章 真乐攻心：邵雍晚期的文学思想	127
第一节 晚年邵雍的圣人心态	127
一、“志士在畎亩”心态向“圣人”心态的过渡	127
二、王安石熙宁变法与邵雍的圣人心态	134
第二节 邵雍对人生的诗化	141
第三节 邵雍的创作思想	147
一、“性”与“真气味”	148
二、“神”与“妙功夫”	151
第四节 邵雍“真乐”的背景	156
一、邵雍的个人之悲	156
二、邵雍历史哲学中的悲观主义	162
三、万事由我	166
第五节 评价邵雍之乐的几个向度	172
一、儒家世外之乐	172
二、自私之乐	174
三、劳攘之乐	176
四、顺境之乐	179

第四章 批评与倾慕：时代对邵雍文学思想的回应	182
第一节 理学家群体与邵雍的文学思想	182
一、二程、张载等理学家对邵雍的评论	183
二、无我之境取径的异同	193
三、孔颜之乐本质的探讨	199
第二节 北宋主流文坛与邵雍的文学思想	203
一、邵雍和洛社诗人的交往	203
二、邵雍文学思想对洛社诗人的影响	209
余论：邵雍文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224
第一节 邵雍文学思想对南宋的影响	226
一、邵雍人格境界对南宋的影响	226
二、邵雍诗学观对南宋的影响	228
三、邵雍诗意生活对南宋的影响	230
第二节 邵雍文学思想对元代的影响	232
第三节 邵雍文学思想对明代的影响	237
一、邵雍学术、人格的影响	238
二、邵雍诗歌的影响	240
三、邵雍诗意生活的影响	245
第四节 邵雍文学思想对清初的影响	247
一、邵雍学术、人格的影响	248
二、邵雍诗歌创作的影响	251
三、邵雍诗意生活的影响	253
结 论	255
参考书目	266
后 记	278

绪 论

一

邵雍（1011—1077），字尧夫，北宋中期的思想家、诗人。主要著作有《伊川击壤集》和《皇极经世书》。他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在继承传统儒家的基础上，对理学的产生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理论在当时是作为一种学术现象出现的，具有“在野”的身份，是对传统的继承与超越和对当时社会思潮及官方意识形态批判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他和其他几位理学家的哲学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到了南宋末期为官方所认可并成为元代、明代、清代的官方意识形态。

邵雍的文学思想是他哲学思想逻辑性的延伸。随着他哲学思想地位的提高，他的文学思想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渗透到当时文学的多个侧面。这种地位决定了研究他文学思想的重要性。

但是，在南宋时期，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对邵雍等“北宋五子”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总结和过滤，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后世的研究者更多地是研究朱熹或通过朱熹来研究邵雍；另一方面，通常认为朱熹已经代表了理学思想，甚至把邵雍的观点当做朱熹的主张来研究，而对邵雍的哲学及文学思想的研究却采取了较为轻视的态度，至

今并无大的改观。许多观点和资料只是陈陈相因，没有多少创见。这种状况决定了研究邵雍文学思想的必要性。

邵雍的文学思想从逻辑上说一般是从三个层面展开的：一是在天道境界谈文学；二是在生命境界谈文学；三是在文学创作层面谈文学。学界对邵雍文学思想的研究更多地是从第三个层面展开，只是就文学谈文学。即使能从第二个层面上谈，也是从他的理论中切割出几条语录或摘出几首诗或举几个事例同自己要谈论的问题粘贴在一起，似乎始终上升不到活生生的完整生命境界及其思想的最本源处，结果出现诸多误解。由于对邵雍文学思想的研究还有许多需要挖掘的地方，这就给我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邵雍的审美观、文学价值观受其人生价值观、天道观的影响极大。当然，这也只是从逻辑上讲。实际上，他讲天道观、讲人生价值观就包含了文学价值观和文学审美观，并非次第而出，今天讲一个天道观，明天讲一个人生价值观，后天讲一个文学价值观，以后再讲一个文学审美观。选择这个题目的本意是要从哲学“本体”的层面上来研究邵雍的文学思想，以求得本来的面目，弥补相关学术研究的缺憾。

二

邵雍无论从其学术，还是人格，抑或其文学思想都呈现为复杂的状态。20世纪以来的研究大抵重在其文学创作一端，而对其评价则不出两种态度：一是较为客观的评价和赞扬；二是较为严厉的批评。其实，这也是邵雍文学思想出现以来历代评价的两个向度。

从第一种态度来说，新中国成立前和20世纪80年代后表现得比较突出。谢无量说：“邵尧夫《伊川击壤集》最为诗体之变，后世乃推为诗人以来所无者。盖择义既精，出言虽杂雅俗，亦非所计。”^①

^①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八第4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郑振铎说：“至所谓道学家的，方真实的以‘道’为主，以文为辅。故许多的道学家，其文章往往自成为一个体系，正像邵雍的诗一样。”^① 柯敦伯认为：“道学派以经术道德自任，本不屑屑于词章之末。然当时言古文者必曰返雕为朴，折衷于经术，因文以见道，彼道学派既拳拳于‘文以载道’，则亦甚有协于文体复古之趣。故周、邵、张、程、朱、陆诸人之文，其说理精粹，有从容闲暇气象，以平实坦易为主，以言返朴还淳，或又非普通文士所能几及。”^② 方孝岳认为《伊川击壤集序》“完全代表了一种淡然忘情的文学”，“《伊川击壤集》在文学界中特树一帜”，“客观不动性情，是玄学家的话，拿来论诗，毕竟隔了一层”。“他守着一种悠然自得的态度”，“是另外一种境界，毕竟不是普通的境界”。^③ 林庚指出“虚静之境，便是存养的极致，而达于物我两忘的澄明境界。这似乎又于东方一种诗的意境相去不远，宋人的理学因此有了更多的意义，它非特是儒道合一的最后发展，且成为这诗的国度的一个归宿”，但又说“所以这淡泊的玄味，即使不因为理性人生的补充而产生，也将因诗坛的渐趋结束而出现。它乃是文化情操趋于老化中，通过概念思维而找到的一个最后的解释”。^④ 这些论述都从大处着眼，极为深刻而符合实际，后来对邵雍的总体评价大致不出这些论述的范围。

当然，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段也不是没有较为客观的研究，如罗根泽认为“反对歌咏一身体戚是邵雍的新说”，邵雍指责的“近代诗人恐怕包括欧阳、苏、梅。果尔，可以知道学家的别创宗派另建文论与不满当时的文学家有关了”。邵雍为了实现“垂训”的主张，“提出最好‘以道观道’，其次，‘以道观性’的写诗方法”，^⑤ 这些论述都是实事求是的。

①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5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柯敦伯《中国文学史》第412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③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第71、72页，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

④ 林庚《中国文学简史》第3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三）第72、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0 世纪 80 年代后对邵雍的研究相对于新中国成立前有两点不同：一是新中国成立前多是在文学史中论及，大多概而述之。而 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研究，除了出现在文学史、批评史中，还表现为大量单篇论文的出现。二是随着单篇论文和文学批评史的大量涉及，对邵雍文学的研究内容进一步细化了。比如对邵雍文学创作的方法、内容、态度、风格、技巧、审美境界等都作了细致的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马积高认为邵雍的诗论“比较系统。其理论基础则是他的‘以物观物’说。所谓‘以物观物’是对‘以我观物’而言的，即排除个人的感情，而去体察万物，从而达到所谓‘穷理’、‘尽性’、‘知命’”。^① 这对邵雍创作方法的论述是很精确的，的确抓住了邵雍诗论的核心。

在创作的内容上，刘天利认为理学诗派的文学创作主题是“阐发性理”和“抒写闲适情趣”，^② 比较符合邵雍的实际。吕肖焕认为理学家诗作表现内容以“义理为最重要”，是理学诗派的“最大特色”。“理学家从‘孔颜乐处’、‘曾点意思’入手，把山水风月当做怡情体道的对象，从而使端庄敬肃的儒家思想也具有了新鲜活泼的诗意，山水风月诗因此成为理学诗派的主要内容，这一做法改变了六朝以及唐代的山水风月诗一般只与老庄、佛禅相关的局面，具有重大的意义。”^③ 从诗歌史的角度指出了邵雍等理学家对诗歌的贡献。

论及邵雍的创作态度，梅俊道认为：“邵雍对诗歌创作的基本态度，应是一种不执著、不追求，不即不离，顺其自然的精神。”^④ 程杰指出理学家的创作态度是“咏适性情为意”，诗歌艺术价值观是“无意为诗”。^⑤ 许总主编的《理学文艺史纲》认为：“邵雍直陈胸臆，务求浅切，‘兴来如宿构，未始用雕琢’的创作态度，明显体现为‘不复

① 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第 44 页，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刘天利《宋代代理学诗派研究》第 28、33 页，2002 年博士论文，国图保存本。

③ 吕肖焕《宋诗体派论》第 280、282 页，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 年版。

④ 梅俊道《邵雍的诗歌理论及其诗歌创作》，《九江师专学报》1992 年 2、3 期合刊。

⑤ 程杰《宋诗学导论》第 102、103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以文字为长，意所欲言，自舒胸臆，原脱然于诗法之外’的特点，不仅不计工拙，甚至有意突破诗的法度乃至传统创作习惯。”^①而张海鸥径直认为邵雍诗学是“快乐诗学”^②，就不免偏颇。

论及创作风格，吕肖焕认为理学家的诗歌在风格上表现为“词平音淡”。邵雍的诗“整体情调欢快畅达，是以悲哀之音为主的传统诗歌中少有的乐诗”，“有特殊意义”。“邵雍可以说是理学诗派中最不受传统约束、最有独创性的诗人”。^③邓红梅认为：“‘邵康节体’诗歌以‘自在’取胜。它在诗学途径上空诸依傍，在写作心态上随意闲适，不讲究格律的经验和语言表达艺术，是宋代诗歌主流之外的别调。但这并不意味着邵雍诗歌与时代诗歌风尚完全分离。在自在和自得的创作心态支持下，他将所谓的‘宋型诗歌’带向了诗歌这种文体所能承受的变异之极限，到达了诗与散文的分界线。”^④指出了邵雍诗歌风格在诗歌史上的创新，很有代表性。

在诗歌的功用上，郑定国点出邵雍“诗以垂训的主张”^⑤。吕肖焕则指出“邵雍特别关注诗歌的美刺教化作用”^⑥。这指出了邵雍诗歌功用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能说是全面的。

论及邵雍诗歌的审美境界，李满认为“邵雍极端重视艺术的社会道德功效”，这秉承了儒家美学传统。但他又醉心于“吟咏性情而不累于性情”，“这又带有深深的道家美学思想的烙印。他的美学思想既有重道崇实的一面，又有怡情悦性的一面”。^⑦范希春认为邵雍的美学思想是“忘情尽性境界”^⑧。李春青认为邵雍“观物”说“实质

① 许总主编《理学文艺史纲》第11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张海鸥《邵雍的快乐诗学》，《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③ 吕肖焕《宋诗体派论》第278、288、289、294页，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④ 邓红梅《论“邵康节体”诗歌特征及其对于宋代诗坛的意义》，《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⑤ 郑定国《邵雍及其诗学研究》第24、27页，文史哲出版社2001年版。

⑥ 吕肖焕《宋诗体派论》第272页，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⑦ 李满《邵雍美学思想述评》，《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⑧ 范希春《宋代中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研究》第38页，2001年博士论文，国图保存本。

上乃是一种艺术化或审美化的人生境界”^①。刘天利认为理学诗派的文学创作“在形式上反对巧饰，崇尚自然朴拙之美”，“内容上反对激情，崇尚中和平淡之美”。“‘平淡’风格体现了人的精神修炼功夫。”审美取向是“题材内容的雅正，意象的清和，艺术表现的平易自然”。^②吕肖焕认为，“从审美理想和情趣上讲，理学诗人都继承发挥了《诗大序》中温柔敦厚的诗美说”。^③王竞芬指出邵雍的诗歌境界是“逍遥安乐”^④。这些论述都能指出邵雍诗歌的某些重要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迄今为止邵雍文学研究的第一部专著，那就是台湾学者郑定国的《邵雍及其诗学研究》^⑤。这本书资料丰富，创获颇多，尤其是对邵雍诗歌创作艺术的解读十分细致：在第四章中对邵雍诗歌的语法、色彩、词藻、用事进行了研究；在第五章中认为邵雍诗歌有喜乐、幽默、恬淡的意象；在第六章中对邵雍诗歌的平仄、用韵、句法、句式进行了探讨；在第七章中认为邵雍有内省挫折、忧道和气、养生安乐、天机幽默、自然理趣的境界；在第八章中认为邵雍诗开创了理学诗的新纪元。此书在邵雍诗歌艺术的研究中最为详尽，但也有不少缺憾，表现在：其一，像以前的研究一样，对邵雍的研究重点仍然不出诗歌创作艺术本身；其二，缺乏对邵雍生活的时代背景、家庭背景、学术渊源、哲学、心态、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倾向的关联性研究；其三，是一种共时研究，见不出邵雍文学思想及诗歌创作发展的历时过程，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还存有缺憾。

至于对邵雍诗歌创作的批评，则从南宋以来不绝如缕。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段时间表现得更为突出。南宋叶适也只

① 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第206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刘天利《宋代理学诗派研究》第20、21、22、39、41、43页，2002年博士论文，国图保存本。

③ 吕肖焕《宋诗体派论》第276页，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④ 王竞芬《逍遥安乐的审美人生——略论邵雍儒道兼综的境界美学》，《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⑤ 郑定国《邵雍及其诗学研究》，文史哲出版社2001年版。

是批评部分理学家末流的诗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对邵雍、周敦颐、程颢的诗并无特别的批评。而此段时间之研究者由于当时国家意识形态的原因，多数思想偏激，一口否定理学诗。比较典型的如敏泽认为邵雍“一方面认为诗感于物而产生的，并对感物之情作了解释”，但实际上“完全推翻了他自己的感物、怀时的主张。而排除了作者的感情，离开诗的抒情的特点而奢谈反映思想、时代，那么，文学就只能变成冷漠的说教，或者‘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而不会再是真正感人的文学作品”。^①周勋初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在标题为“道学家抹煞文学的谬论”一节中更认为道学家的文论“迂腐顽固，而又严重脱离现实”，“头脑僵化”、“武断”、“片面”、“妄自尊大”、“迂执”、“无知”。此论近于谩骂，颇值得商榷。

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研究，虽然也不无批评，但态度要客观一些，如张少康等指出“到了周敦颐、邵雍和二程则已完全转向儒学义理探讨，而对‘文’已不感兴趣了，并且认为如果重视‘文’的写作，就会妨碍对儒学义理的探讨。为此，他们在文学观上片面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抹煞了文学的独立性，否定了文学的美学特征，这无论在理论批评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对文学发展都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邵雍“否定了《毛诗大序》主张诗歌是‘吟咏性情’的思想，而强调诗歌应是‘天理’、‘人性’的体现”，“从而取消了诗歌的抒情本质。情理对立，主理抑情，是道学家文学观的基本特征”。认为道学家把文学理论上的一些基本问题给搅混了，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对文学创作上情和理的关系，作出了错误的论断，强调说理而否定抒情，提倡言志而反对缘情。”“第二，在文学创作的艺术关系，即质和文的关系上，道学家的观点表现了突出的重质轻文、重思想不重艺术的片面性。由此他们否定了文学本身的独立价值，贬低了文学家、艺术家的地位。”“第三，在文学观念上复归到

① 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489、4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古代文学和非文学混同为一的状态，取消了文学的美学特征，抹煞了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第四，否定了文学的具体性和现实性，把它变成了抽象的理学心性义理的图解，使之成为理学‘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这样就把文学和生气勃勃的现实生活隔离开了。”^① 祝尚书认为“混淆学术与文学的界限，是这派诗人的致命弱点”^②。这些批评虽然态度有所缓和，但明显是站在所谓“纯文学”的角度进行评论的，观点还很牵强和片面，仍带着时代政治影响的尾巴。至于像朱世英等认为的“邵雍忘情，从根本上断了文学发展的路”^③ 则有武断之嫌！

从以上研究状况的总结可以看出，在邵雍诗歌创作研究的层面上有一些成绩，虽然很难说是全面的。但更大的问题是何以会出现这些文学观念？这些文学观念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过程？邵雍的作品是如何体现他的文学思想的？他的文学主张和他的创作实践是否一致？可以说，在这些问题上，以前的研究还没有作出回答。本文则试图对以上问题予以探究。

三

文学思想史是“史”的一种，而当前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欠缺的正是“史”的方面，即缺乏历史发展中的内在“关联”性，这是翻开 20 世纪以来绝大多数此类著作都可以感觉到的。余英时先生对中西近现代以来的历史研究作过一些总结，对此说法可以作一注脚。他认为中国目前的史学研究不落入决定论就落入史料学^④，属于

① 张少康等《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下）第 34—38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② 祝尚书《论“击壤派”》，《文学遗产》2001 年第 2 期。

③ 朱世英等《中国散文学通论》第 93、95 页，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④ 余英时《〈历史与思想〉自序》，《史家、史学与时代》第 117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剪贴派”的研究，仅是对玄想规律的追求，对权威看法的汇集或史料的收集，而对“批评的历史学”还相当的陌生。所谓“批评的历史学”在于重视由“历史的证据”和“历史的想象”所构成的历史过程。^①“批评的历史学”，也叫“科学的历史学”，是对“剪贴派历史学”或“玄想派历史学”的反动，是进一步的发展。但余英时也指出了前者的不尽人意之处，他说：“就我个人理解所及，我也觉得他^②一方面过分注重历史的‘内在面’与夫‘将心比心’的领悟，另一方面又极力强调‘证据’的重要性，也是一严重的矛盾。因为当我们设身处地‘重演’古人的意境时，我们很难找到任何证据来‘证明’古人思路正是如我头脑现在所‘重演’的。”^③

左东岭先生在总结文学思想史学术方法的特点时，特别提出以下几条：其一，求真求实与历史还原；其二，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結合；其三，历史环境与士人心态的研究；其四，心灵体悟与回归本位。^④同时，他对个体的研究又提出了特别的要求，认为除了政局变化、思想潮流，士人的具体生活境遇对代表人物的影响“情况就会更复杂一些，诸如家族文化传统、社党组合、朋友交往、婚姻状况、特殊遭遇等，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⑤

左先生特别强调文史哲贯通而落点于文学，但更为关键的是，他并不是泛泛地讲贯通，而是把它落实到可操作的层面上。具体来讲，在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上，他强调过程性和内在关联性；在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上，他除了强调心态，也强调两者之间过渡性的分析；对于文学本

① 余英时《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介绍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史家、史学与时代》第12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指柯林伍德，“科学的历史学”或“批评的历史学”的提出者。

③ 余英时《章实斋与柯林伍德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史家、史学与时代》第14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 左东岭《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罗宗强先生学术思想述论》，《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⑤ 左东岭《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罗宗强先生学术思想述论》，《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身，他则重点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左先生的这种学术思想方法既有对真正历史规律的宏观追求，又有对历史真实发生过程的努力把握；既把对历史人物的心态建立在社会学、心理学的基础上，又把对古人作品的审美感悟建立在阅读心理学的基础上；既吸收了前述方法的优点，又努力避免了它们的缺点，达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对前述两种历史研究方法的总结、超越和发展，是文学研究中的新角度。

本文采取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在具体步骤上把文章分为四章：第一章具体结合北宋中期的文学潮流、学术潮流、政局变化分析邵雍的主要倾向——出仕；结合邵雍的家学传承、师学关系、生活环境分析他的次要倾向——归隐；并在此基础上谈邵雍早期的文学创作倾向。第二章分析邵雍中期在“口代天言”主题下的文学思想，核心内容是他“志士在畎亩”的心态、“口代天言”的含义及这个主题对文学的功用、诗歌的境界、创作原则、创作过程、创作内容的要求。第三章分析邵雍在“真乐攻心”主题下的文学思想，主要论述他的圣人心态、诗意人生、创作思想及对邵雍之乐的定性。第四章关注北宋理学家群体和诗人群体对邵雍文学思想的回应，核心内容是他们具体交往过程中的共同话题和相互影响，邵雍由此得以打通他和其他新儒学思想及北宋主流文坛的关系。而余论则简单勾勒出邵雍文学思想对后世影响的线索。

本文在写作上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凡是已经研究得比较充分的问题，本文只提出前人研究的线索，不再进行变换叙述方式的重复论述；对于研究得不够充分的问题，只补充必要的部分；对于尚未研究的部分，则详细论述。

四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阐明了邵雍文学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进程。以邵雍人生

价值观、哲学思想、心态的变化为标志，将其文学思想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以显示其文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并对各期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有别于以前学界所有的相关研究。

（二）阐明了邵雍各期文学思想的主题。邵雍的文学思想是丰富的，在三个时期都有具体的表现，但每一个时期都有其核心的主题在支配着。他早期主要是以回归三代为理想，表现为志士的心态，热衷于科举功名，文学倾向与传统文人是一致的。中期，他选择了隐居洛阳，立德、立言，纳外王于内圣，树立了成圣的目标。他以《皇极经世书》为依托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以诗歌创作著善恶、明垂训，提出迥异于前代和当代的文学思想，那就是“口代天言”，把矛头指向前代和当代的文人。在此指导下，他创立了完整的理学文学思想体系。他的晚期以圣人自居、以太极自许，心如止水而又真乐攻心，完成了他的诗意人生。

（三）阐明了邵雍与理学家群体和宋代主流文坛的关系。邵雍和理学家群体的交往促进了他理学文学思想的发挥和建构，和洛阳诗人群体的交往使他打通了宋代的主流文坛。

（四）阐明了邵雍文学思想的文学性和非文学性。这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一是他的哪些思想是对文学性的消解以及消解了文学性的哪些方面；二是他的哪些思想是对文学性的建构以及建构了哪些东西。即分析作为思想家和诗人的邵雍是如何看待文学的，哪些看法和文学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哪些是不一致的，哪些是他独特的创造。比如他的“删后无诗”论、“观物三层次”等都涉及文学家和理学家如何定义文学，如何创作文学的问题，明显地体现出文学家追求个性创作、抒发个人感情以及求“美”的愿望；同时也表现出理学家追求共性创作、抒发天下大义以及求真、求善的主题。而这种不同的文学标准表现在作品中就形成了不同的风貌。

（五）阐明了邵雍文学思想中“忧”的倾向。以前对邵雍文学的所有研究都以他的“乐”为对象，而忽视了他思想中“忧”的倾向。